

# 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與唐代的興衰

一九七〇年十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二百多件唐代金銀器中，有一件銀壺不但形制特殊，紋飾精美，而且還反映了大唐帝國從興盛走向衰落的歷程，因此，自出土以來便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和高度重視，它就是早已蜚聲中外、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圖一）。

在唐代，使用金銀器是上層社會竭力追求的一種時髦。唐代金銀器的使用數量之大，既不是前代所能比擬的，更不是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唐代金銀器的使用盛況，主要體現在各種金銀器皿的大量使用上。由於唐代

貴族權要愛講排場，多喜豪宴，每宴動輒邀請數十成百公卿大臣，費錢以數十萬貫計。如此大規模的宴會，必然需用數量極大的各種飲食器，再加上當時權貴迷信使用金銀飲食器有延年益壽的功效，因此，宴會使用的飲食器特別講究用金銀來製作。「誰能載酒開金盞，換取佳人舞繡筵」、「鳳凰尊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以及「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熱」等唐詩，既反映了當時貪淫奢縱、醉生夢死的社會風氣，也道出了金杯等金銀器皿在唐代的流行情況。這件作工精美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就是當時宴會上用來盛酒的容器。而它之所以引起今人的極大關注，則主要在於其壺體兩面所模壓的舞馬形象。

關於舞馬，《唐書·音樂志》、《明皇雜錄》等古籍中均有記述。玄宗時，宮廷中馴養了好幾百匹舞馬，玄宗經常親臨訓練場觀看或親自訓練。這些舞馬被分成左右兩部，每匹馬還取有如「某家寵」或「某驕」的名字。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節」）這一天，便在興慶宮的勤政、花萼兩樓下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並以



圖一 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舞馬助興。這時，舞馬披金戴銀，在《傾杯樂》的節拍中躍然起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舞姿翩翩。高潮時，舞馬則躍上三層高的板床上旋轉如飛。有時，還讓壯士把床舉起，讓馬在床上表演各種驚險奇妙的舞姿。而穿著淡黃衫、繫著文玉帶的姿色秀美的樂工則站在周圍為舞馬伴奏。曲終時，舞馬口銜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壽。

唐代曾留下許多關於舞馬的詩詞。玄宗時的宰相張說，擅長文辭，被時人稱為「大手筆」。他曾多次奉陪出席舞馬宴會，目睹其景，寫下了十多首舞馬詩詞。其中最有名的是《舞馬樂府》：

聖皇至德與天齊，  
天馬來儀自海西。  
腕足徐行拜兩膝，  
繁驕不進踏千蹄。  
鬣鬣奮鬣時躡踏，  
鼓怒驤身忽上躡。  
更有曲杯終宴曲，  
垂頭掉尾醉如泥。

在這首詩中，張說描繪了舞馬縱橫應節，徐行跪拜的美妙舞姿。而他

在〈舞馬詞〉中則描繪了舞馬銜杯敬酒，為皇帝祝壽的場面：「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這是許多文獻上沒有記載的。唐代詩人杜甫〈千秋節有感〉詩中的「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也是對千秋節舞馬活動的直接描述。看來，千秋節舞馬活動之高潮的標誌便是舞馬口銜酒杯，按照音樂節拍而舞蹈，以表示為皇帝祝壽之場面。而這件銀壺壺體兩面模壓的駿馬，正作翹首鼓尾、銜杯跪拜狀，其造型與上述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充分證明了銀壺上的舞馬就是為玄宗祝壽的舞馬形象。

這件銀壺通高一八·五，口徑二·三公分。其造型採用了我國北方游牧民族攜帶的皮囊和馬鐙的綜合形狀。扁圓形的壺身頂端一角，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式的壺蓋，蓋頂用銀鏈與弓狀提梁相連，壺底焊有橢圓形圈足。這種形制，既便於行軍、外出時攜帶，又便於日常生活使用，表現了唐代工匠在設計上的匠心獨運。此外，弓狀的提梁、覆蓮瓣壺蓋，以及壺身兩面所飾的駿馬均飾以鑲金，黃燦燦的金色與銀白色的壺體交相輝映，色調格外和諧富麗，

陣鼓樂聲起，這些舞馬也習慣性地應節跳躍起舞，飼馬軍士以為是妖怪，便用掃帚擊打，但仍然無法阻止舞馬跳舞，田承嗣以為是馬怪，便命軍士將其鞭撻而死。從此，舞馬祝壽這一獨特的宮廷娛樂形式便從中國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了。「漁陽擊鼓動起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的鐵蹄代替了「飄然旋轉」的舞步，幽燕胡兒的胡笳戰鼓淹沒了「磬簫箏笛」的柔音，夢幻般的生活像突然斷了絲絃的琴似的戛然而止。儘管八年後戰爭平息，但大唐王朝卻因遭此戰亂重創，元氣大傷，杜甫〈憶昔〉詩中所描繪的那種「憶昔開元全盛日，十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盛世景象，也只能永遠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中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唐王朝從此終於走上了風雨飄搖的衰落之路。

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唐代宮廷祝壽活動的特寫，也證實了有關史書記載的準確、可靠。同時，舞馬的盛衰，伴隨著唐王

歌舞昇平、雄渾博大的盛唐氣象盡現於此。

唐玄宗是唐代的一位傑出皇帝，在他的統治下，唐朝社會經濟高度繁榮，國力空前強盛，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開元盛世」。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位本就風流成性的皇帝在其統治後期愈發奢侈荒淫、疏于朝政，縱情於「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中，給表面歌舞昇平的社會埋下了深刻的社會危機，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天寶年間，安祿山一身兼任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權勢日增，驕恣橫行。為了奪取中央政權，以誅楊國忠為名，于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在范陽（今北京市）發動了武裝叛亂，並於第二年攻陷了長安，玄宗李隆基攜楊貴妃倉皇出逃。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由於安祿山是楊貴妃的養子，他在天寶年間曾多次入朝見過舞馬祝壽的盛況，因此，入京後擄掠了數十匹舞馬帶回范陽。安祿山敗亡後，舞馬轉歸其大將田承嗣所有，但他把它們當作一般的戰馬飼養。一天，軍中宴樂，隨著陣

朝的盛衰，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是唐代社會發展的縮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件銀壺還反映了唐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大唐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馬鐙式壺，在遼金時代的古墓中常有發現，但在唐代的金銀器中則是首次發現。這種形制的壺，學術界一般把它當作是契丹文化的典型器物。契丹是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有唐一代，它與唐王朝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契丹人不但從漢族那裏學到了許多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契丹文化也被中原吸收、融合。這件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在唐都長安的出土，正是漢族和契丹等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明證。

唐代舞馬，作為一種宮廷娛樂活動，還可能隨日本遣唐使東傳到日本。日本太平勝寶八年（七五六）的《東大寺獻物帳》記載有「舞馬屏風六扇」：「高五尺，廣一尺八寸。紫地錦緣，金銅釘，漆木貼，碧綾背，緋衣接扇，黃絕袋，白練裏」。可惜日本的舞馬屏風也沒有保存下來。但不管怎樣，唐代舞馬對日本影響應是毫無疑問的。

